

师专往事

1980年，我参加完高考后，接到晋东南师专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经过短暂的犹豫，10月的一天，我和我的行李乘一辆帆布篷212吉普车去师专报到。是否由我父亲亲自把我送去的，我已经记不清了，但吉普车是我父亲单位的，是他派车去送我的，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此前我母亲还答应过我，如果我同意去上师专，她会每个月发给我二十元零花钱。因为师专是一所食宿费用全免的学校，二十元零花钱就会成为真正的零花钱。这一点很重要。我考前是晋城发电厂学徒工，我的工资就是二十元。我等于是带着一份完整的工资去上学。但我并没有因此而兴高采烈。实际上我是带着几分忧郁几分愤懑几分无奈的心情做出去师专的决定的。我的高考成绩是本地区第一名，我本可以去北京大学，去全国任何一所在山西省招生的名校就读，但我却只能上师专，这是因为我患有小儿麻痹后遗症。而且，师专能录取我，还因为我父亲跟那里的老校长给我走了“后门”，否则师专我也不一定能上。但父亲一直瞒着我，没有让我知道我是通过“后门”走进师专的。我父亲这样做可能是考虑到我的自尊心。那一年我十九岁，血气方刚，我是本地区的文科状元，我的自尊心是应该被给

予保护的。连我父亲那样唯我独尊的老干部都考虑到这一点，由此可以想到高考分数的分量之重。

晋东南师专是一所建于1958“大跃进”之年，60年代初期即被撤消，1977年恢复重建，1979年才正式挂起师专这样一块招牌的学校。我去了即发现我们的宿舍和教室全是中学式的平房，教学楼尚在修建之中。一个不成形状而且极小的校园里，到处是灰尘和瓦砾。我们80中文班的全体男生，三十多人，一齐住进了一间充当临时宿舍的大教室里。我冷眼旁观那些乱哄哄的人们，想到今后三年将与他们为伍，心中涌起一股高傲和失望相混杂的情绪。后来我知道，我看人时，人也在看我。一位同学与我熟识后告诉我，他看见我走路的姿势以为我是一名校工，可能是来帮助他们打扫卫生的，直到当天晚上他看见我在我打扫过的那个铺位上睡下了，才明白他们班上居然有我这样一个学生。

虽然我知道入学后会有一次类似资格审查的考试，但我却只带了一套《福尔摩斯探案集》去的学校，我把考前复习用书全部丢弃了。我看到同学们紧张地复习那些在高考复习班上已经复习到令人讨厌的功课，感觉到十分好笑。于是，我在资格审查考试中只得了一个全班十几名的平常成绩，这招来有的同学的质疑，他们暗中相问，他不是考上北大的吗？我无法掩饰也不曾想过要掩饰的高傲已经惹起部分同学的反感，但我毫不在乎。我当时已经在心里暗自做出决定，我将永不再追求任何分数，让那个荒诞的一钱不值的数字见鬼去吧！

几天之后，一个77中文的老生去我们宿舍找我，他让我代表

新生写一篇作文，由学生会刊登到饭堂前面的那块黑板报上。题目和内容由我自拟。我写的是我多么向往今后从事教师这个职业。我的作文引起老生们，特别是老生中的老三届学生们的公愤，他们把吃剩下的窝窝头和稀饭抛向我的作文。师专的大部分学生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那就是毕业之后能够不当教师。这个理想的名称叫作“改行”。三年的专业学习就为了离开所学的那个专业。最后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实现这个理想并因而自鸣得意。这真叫人匪夷所思。

我虽然觉得“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个说法有些夸张，有几分俗气，但我确实认为教师是一个值得从事的职业。教师以直接地改变人为目的，他使无知的人变为有知，使懵懂者树立起理想，使人生的空虚变为存在的觉醒。就连我心目中的另一理想职业作家也无法与教师相媲美，因为作家的工作方式是孤独的，不像教师有着直接的日常的戏剧式的挑战性。此二者之外，再没有我真正想贡献一生的工作。但显然老生们认为我是在说漂亮话，是一个虚伪的还没有挨过教训的新来乍到者。所以他们愤怒地表示了对我和我的作文的鄙视。今天看来，在人文价值全面觉醒，我们民族的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80年代初，人们没有对教师这个职业表现出应有的尊敬，这是至今令我感到不解的。我相信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误差，并且我相信这个历史的误差应该为今天的某些社会后果负有一定的责任。当然，社会现实本身就是一个最具说服力的教师，要让教师成为好的职业不能单靠这个社会现有的教师和未来的教师们，它是一个社会总的理想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

虽然师专的学生们不愿从事中学教师这个行当，但他们对正在给他们授课的大学教师却怀有崇敬之情。我很快就从老生们的嘴里熟悉了一连串的名字：宋谋场，大名鼎鼎的右派，红学家，一个不拘小节的传奇人物；储仲君，风度翩翩的才子，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兼俄罗斯文学翻译家，刚刚翻译出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舅舅的梦》；李蹊，“文革”前北师大中文系高才生，学富五车并异常严厉……这就是中文系的教授们。中文系是师专最具实力的大系。而首先令我震撼的第一堂课是开学典礼大会上中文系主任刘发昆代表全校教师给我们这些新生致的欢迎辞。他在那个欢迎辞里讲了书籍的历史和现状，描绘出一幅未来学习生活的宏伟前景，为我闻所未闻。我突然意识到，大学有大学的学习方式，大学教师完全不同于中学教师。我仿佛看见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吱呀”一声向我打开。

开始上课了。李蹊老师讲写作课。他说，写作课本来应该由鲁迅先生来讲，因为鲁迅先生是最伟大的作家，深知写作的奥秘，但鲁迅先生死了，只好由他来勉为代替。这个开场白令我对这门课和这位老师充满了期待。我后来知道，在中国几乎所有大学的中文系，写作课都被认为是一门次要的课，是一门无人愿代的课程，因为写作不是学问，没有多少可讲的。我不记得李老师当时是否讲过大学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这样的话，但这话肯定有老师讲过。写作课之不受重视，我认为是中文系的自我意识（假如它有的话）中的一大误区。虽然鲁迅先生死了，但活着的作

家大有人在，如果写作课能由类似于西方一些大学的“驻校作家”来担任，它将成为一门重要的具有它本身的终极理想的课程。写作课也许的确不是一门学问，它是一门经验主义的课程，是对于已有写作经验的总结，我认为它尤其应成为对于当代的写作经验的探索。但可惜无论在80年代还是现在，它都不是这样一门课程，它只是一门程式化的无足轻重的课。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但无论如何，李老师的写作课却让我开眼了。可是有老生告诉我中文系听课三部曲，第一部是听李蹊的课，第二部是宋谋瑒的课，第三部才是重头戏储仲君先生的课。到这三部曲听完，才算是深入中文系之堂奥了。师专中文系的实力所在是中国古典文学。当时师专有一说法，说把宋谋瑒和储仲君二先生放到全国任一大学的古典文学教授的行列中，都毫不逊色。很快就有事实证明了一点。1981年全国师专古典文学课程研讨会由晋东南师专主办，会议地点就在师专所在的山西省长治市，到会的有一大批有头有脸的人物，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复旦大学均有名教授到会。储仲君和宋谋瑒二先生的学术水平得到外来“和尚”们的公认，从而也更加得到师专师生们的崇拜。会后，储仲君先生关于唐代诗人研究的一部书稿得由中华书局确定出版。有参加此次会议的北大某教授说，储先生放到北大也照样是教授！而宋谋瑒先生甚至都无须任何人的认可。他早在50年代即在香港大公报发表文章，并因此被打成右派，他是与王蒙等四人一起作为右派在人民日报上亮相的。因此他是大右派。他被打到农村当公社社员十几年，他能一边看磨面机一边读《红楼梦》。他四十未娶却有的

是女人。他是到师专以后才结婚的。他的妻子对他如何地严加防范成为全校公开的秘密。他在“文革”期间与郭沫若、茅盾等一大批名流有过关于《红楼梦》的书信往来。到宋谋瑒先生家中参观那些书信，成为很多老生和年轻教师津津乐道的谈资。

我有幸在师专第二年就亲聆到二位先生的授课。储先生讲唐代文学在先，宋先生讲宋代文学在后。本来在师专这样的小学校，唐宋文学只是一个教学时段，只需一位教师代课，安排由两位先生分开来代，其用意我猜有二：一是任何一届学生都应得到两位名师的亲授，否则这一届学生在师专中文系的所得就有重大缺憾了；二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华尽在唐宋之前，元明清文学的讲授无须名师，可由青年教师来担任。储老师讲唐代诗歌果然精彩至极。我至今不忘他在第一堂课上讲王绩《野望》一诗时的大致情形。储老师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讲课或与人交谈时给人的感觉似乎只微微瞥视对方一眼，随即就把眼睛里的光芒收回到了眼镜片的后面。他给人一种高傲的和难以接近的感觉。但实际上任何老师都愿意与他的学生交流，这是他们获取当代经验的一个重要途径，他们可以借此多少摆脱一些精神上的孤寂。储老师就曾在课堂上用他特有的略含讥讽的语调抱怨我们班的学生没有在他特意安排的时间里去向他提出问题。他说只有班长一个人可能怕他寂寞，陪他去略微坐了一小会，但也没有提出任何问题。那个班长就是我。当时储老师把周几的一个晚自习时间安排为可以向他提问的时间，他坐在和我们的教室同在一条走廊里的中文系办公室等我们。我本来应该就中国古典文学的问题向他请教，但

我当时的兴趣早已转向外国文学，尤其是俄罗斯文学。我跟他谈了一会陀思妥耶夫斯基，问了一个关于托尔斯泰的问题。他说他本来是想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群魔》，但他觉得《群魔》难以出版，所以翻译了《舅舅的梦》。实际上在储老师说过这话不久以后，中国就有了《群魔》的译本。储老师对于中国思想解放的进程看来是估计不足了，他错过了抢先翻译陀氏重要长篇的机会，只翻译出版了陀氏的一部次要的小书。关于托尔斯泰，我问储老师，我为什么读不进去《战争与和平》？他说，等一等吧，年龄会解决这个问题。事实是，不到一年以后，《战争与和平》成为对我产生重大启示，连续几年不停地被翻阅，令我深深陶醉的一套书。而我当时虽然也怀着激动的心情读了《罪与罚》和《卡拉玛佐夫兄弟》，实际上却是没有读懂。

我们这些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在80年代初接受高等教育之前，完全就是自由生长的野草，我们的中小学时代只是一片空白而已。无论我们在今后做出怎样的努力，我们都将成为文化上的小矮人，因为我们先天不足。我们恰巧在最饥渴的年龄来到大学的校园里，我们也只是短暂地成为疯长一阵的野草。这至少是我个人的真实情况。我在认识到我来师专以前读过的《林海雪原》和《金光大道》之类的书根本就毫无价值以后，只略微翻阅了几本茅盾、老舍和巴金的书之后，就迅速转向19世纪的欧洲文学，然后又顺理成章地过度到20世纪欧洲现代主义文学。我完全脱离开了师专中文系的，以中国古典文学为主流的学习轨道，任凭自己走向一个不知所终的边缘地带。

我在师专的第二年，才刚刚有了一个由两排平房连接成的小型图书馆，我读完了那里几乎所有的外国现代文学的书籍。实际上，那里的所有的外国现代文学书籍加在一起也不会超过几十本，而且都是当时新出版的或者重版的书。我当时以为，要相对完整地读到卡夫卡、弗洛伊德、尼采、普鲁斯特以及萨特等人的著作，只能成为此生的一个梦想。自由地阅读，这是一个有着隐秘的快乐，带着强烈的叛逆性，因为不可能实现因而更加令人憧憬的理想。我曾在《青春与母校的献礼》一文中这样写道：“我终生热爱的一些作家就是首先在这个简陋的图书馆里结识的。比如，托尔斯泰、尼采、卡夫卡、普鲁斯特、加缪、萨特、乔伊斯、弗洛伊德，等等。我在那里读了他们少量的作品，有的甚至就是一些片断，这些作品闪电般地将我击中之后，却使我终生不能自拔。”

我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学习逐渐失去了兴趣。我在异常严厉的李蹊老师的古典文学课上，只听课不完成任何作业，李蹊老师宽容地只扣去了我的一些考试分数而没有给我以令人难堪的训斥。我甚至不听很多别的老师的课。我在上课时间待到图书馆里。我们班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跟高年级班一些同学的名字并列在全校旷课排行榜里，我为此感到光荣。但也有个别不懂得宽容的老师把不上他的课视作对他的藐视，因此愤愤不平，并扬言要报复我。有一位老师在课堂上公然说，来到师专就别指望考什么研究生当什么作家，那是痴心妄想！我在课后对同学们说，如果我想考研究生就能考得上，那没有什么难的。但我没有说我想当作家

就能当成。那是我的理想，如果我把它说成是容易的，就是对这一理想的亵渎。

更加宽容和富有朝气的是一批刚刚毕业留校任教的青年教师。他们是本校中文系77级的留校生。他们中的三位分别给我们班代元明清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课。给我们代元明清文学的那位教师同时是我们的班主任。他虽是老三届，比我们大十几岁，却和我们中的很多人成为朋友。在他组织的读书报告会上，我讲了我读卡夫卡的体会，他虽不读卡夫卡，但却给予我相当大的鼓励。我同时非常留意在场旁听的外国文学老师对我的读书报告的反应。她是一位年轻的女教师，据说她是师专仅有的一名校园女诗人。她对我的读书报告的反应只是微微笑了一下。那一笑令我惭愧数年。我明白了我对卡夫卡和西方现代文学的领悟将会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正是这位女教师，在课堂上以她女性的忧郁的抒情般的语调轻轻念出艾略特的诗句：“世界将是这样崩溃的/不是轰隆一响，而是唏嘘一声”，应和了我内心青春期夸张的绝望以及我对后“文革”时期社会转型的看法。我后来常到她的宿舍去坐一下。我当时还有着对女性的神秘的恐惧，但她是我的老师，我可以以学生的名义克服这一恐惧。她身上的单身女性的忧郁的气质仿佛校园深处的一朵花，可以稍微缓解我与学校枯燥刻板的教学制度的紧张关系。

还有一位年轻教师就是我们的当代文学课李老师。他借给我《别林斯基文集》看，使我对文学评论文体的自由度产生最初的粗浅的但却对当时的我具有革命性效果的认识。他外出开会，带回

了外面的信息，其中有关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的内容。他在简述了后来广为人知的弗洛伊德理论的框架之后，才开始讲他的当代文学课。这些年轻教师，他们在知识积累和专业造诣上，也许只领先他们的学生少许一点点，但他们有着对于知识的开放的态度，有着对于不同学习方式的宽容和对于学生的基本的善意，他们使师专的校园具有了我们的家园一般的气息，是他们使得这一处校园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成为我们生命中一个记忆驻留之地，而不仅仅是一个曾经学到过某些知识的场所。

尽管师专的教学制度及其目的反对它的学生成为作家，但我们班上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在为将来成为一个作家做着努力。80年代的大学校园里还没有弥漫在今天大学校园里的普遍的就业压力，学生们可以自由地憧憬他们的未来。我们班有两个同学去参加了高年级学生组织的文学社团的活动。我就这件事讥讽他们，他们羞于承认。实际上我们所有人都不敢宣称自己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作家，因为那是一个太神圣的高不可及的目标。但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去梦想。难道大学校园不就是一个人生出发之初最好的梦想之地吗？难道理想的大学校园应该是今天这样的充满了焦虑和恐惧的就业准备基地吗？不过，在集体生活中想要完全保守住自己的秘密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把偷看和抢夺别人的小说诗歌练习簿作为一大乐事，而他们必须极尽所能地保守住他们的秘密。这是我们班的情况。高年级和别的班的情况则并不相同。我曾读到过一本油印的三诗人合集，其中就包括我的外国文学女教师的诗。那本诗集前言后记俱全，俨然一个正式出版物的

架式。它就是当时千百种民间诗刊的一种，是80年代文学热在师专校园里的表现。当然，所有做过作家梦的学生并没有在后来都成为作家，只有极少的人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对于大多数人那只是成为他们青春梦想的证明，但我相信他们不会认为那是一个幼稚可笑梦想，那是他们走过80年代的生命中一个重要的纪念，是他们后来形成的人文价值观念的一个重要根源。

甚至有外系不少的学生也想成为作家。他们来我们系找我们进行探讨。我现在记得两个非常有意思的人。其中一个把《人民文学》等刊物上的作品剪贴到自己的剪贴本上，说这是他写的作品，说原作者的名字是他的笔名，而他喜欢每写一篇新的文章就起一个不同的笔名。这个愚蠢的伎俩竟然引起他们班同学对他极度的崇拜。当然后来他很快被识破了。但他似乎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愧疚之意，他仍旧以他一贯的从容镇定的样子出现在人们眼前，使人们觉得他仍旧是一个神秘的人。另一位同学则是进行了一次自杀尝试。他喝下一瓶安眠药以后开始行走在长治街头，结果被一个三轮车夫把他从一座桥头救起送往医院。活过来以后，他把他的死亡经历和他对死亡的探索口述录音到磁带上，由他本人提着录音机到不同的班级去播放。我们班没有邀请他去播放，但我听说了他的主要观点，他说他的死亡预演是为文学创作所做的哲学准备的一部分。

我们班没有上述这类极端的人物。一个班集体也会形成它的性格。我们这个班的性格是羞怯内敛。包括恋爱也是如此。我们班虽然女生所占比例不小，恋爱却只是个别的现象。因为一般是

男生到女生宿舍去谈恋爱，女生基本不来找男生，所以像我这样没有恋爱经历的人便无缘看到发生在女生宿舍的恋爱景象。我们的班主任老师痛惜于我们班恋爱之少，他甚至亲自促成了两对男女的恋爱关系，其中一对至今仍是夫妻。

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只是安静地在图书馆阅读，半懂不懂地在课堂上听课，隔着尘土飞扬的操场远远地窥望我们心中想望却永不敢向她们求爱的女生。我本人则是怀揣着一个作家的梦想，将信将疑地把它与当时的学习生活联系在一起，但对于它的实现却丝毫不敢抱有任何的奢望。老师们无奈地说，80级中文班的学生太老实了，是历届学生中最老实的！我好像比较适合这样一个班集体的环境。它仿佛把任何可能的激情变成了一桩大家共同信守的隐秘，从而使得我们个人的思想可以不受困扰地展开在我们个人的天地里。

转眼之间已经到了毕业的前夜。我记得在教室里举行的简单的毕业晚宴上，有喝不完的红酒，到处流淌的眼泪，郑重其事地互赠留言，趁着酒意大胆地拥抱，等等。我是这场晚宴的组织者之一，但我却始终没有达到上述的激情表演的地步，我连留言册也没有预备。我是否当时在心中暗想，终于要离开了，终于要一个人走了，我现在已经记不分明。但可以肯定，三年的文学阅读使我深信，“生活在别处”，“梁园虽好，不是久留之地”。我渴望着到路上，渴望一条未知的只有我一个人行走其上的隐秘的道路。这条路已经近在咫尺。所谓毕业只是拐向真正道路的一个小小的路口而已。而风景在路的深处。

当绝大部分毕业生都已离校，铺盖卷便全部收集到一间宿舍里，堆放得高至屋顶。有一天晚上轮到我来睡在这间宿舍，看管那些行李。我的班主任老师来和我一起高高地睡在行李堆上，他和我进行了一场推心置腹的彻夜交谈。他说他最后悔的事情是没有帮我在本班女生中找一个对象，以便我可以带着女朋友去经历社会，因为他认为我这样的人到了社会上肯定找不到一个志同道合者，于是就只能组建一个像他的家庭一样的无爱的家庭。而他对无爱家庭的苦楚显然已经尝够，所以他为我惋惜，并因为他没有尽到可能的责任向我致歉。在我的老师当时的想法中，大学不仅是一个梦想的乐园，还是一个现实的乐园，是一个社会的绝缘体，一座真正的象牙塔。人们应该携带着这个绝缘体中的纯洁的观念去改造那个不纯洁的社会。我的老师与我的彻夜长谈，既是我所经历过的一段特殊的师生关系，也是关于80年代初大学观念的一个生动而又典型的写照。

可惜的是我独自一人离开了师专。我在行政机关短暂的工作经历很快使我认识到，我的老师关于社会的认识显然是对的。从此以后，师专就成为回忆和述说的对象。1985年，我的一篇文章在北京得了一个小的全国性的奖项之后，师专中文系请我回去做了一次演讲。我的很多老师坐在下面听了我幼稚而匆忙的演说。看到他们欢喜的眼神，我也油然而生出欢喜之情。我为我是一个师专的毕业生而感觉到欢喜。这种欢喜是安然、隐秘、长久和无法言说的。它至今仍在我的心中长存。

河曲笔会

从晋东南的最南端跑到晋西北最边缘的所谓鸡鸣三省之地去开会，与其说是想去开会，不如说是对这么一趟旅程有所期待。

河曲几年前去过一次，并写有《路上的春天》一文以资纪念，因为那是一个四月，最能看出沿途风景在初春时节的变化。

我喜欢一个人的旅途中的那种波浪般起伏的孤寂与想象。

大汽车如同一只摇篮有节奏地晃荡着，笔直的高速公路给人一直向前的幻觉，根本来不及细看的车窗外的风景总是快速地掠过，一个人置身于众人中仿佛与几十座礁石并列在海洋里，而自己是其中唯一的一座不会思想的暗礁，因为思想在肉身快速地进行中不能持久地保持，于是变成了无足轻重的意识流。

但所有的别人却都是有思想的，无论他们沉默还是发声。身后那对年轻男女连续四个小时的聒噪就为我提供了一本《当代青年人生观大全》，我不免有感谢之意。那女的是一个刚毕业的学化学的研究生，从她无休止的聒噪中跳出一句话，如同一尾鱼跃出了水面，令我印象深刻，她说她们学理科的研究生发表论文是很

容易的，而文科的研究生发表一篇论文则很不容易，这是因为文科很难找得到创新点。

我坐在他们前面，一个人在心里回应她道：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个学生学习文科的基本知识并不为了寻找创新点，也不应该是为了论文的写作，而是为了对于人类基本观念的一次亲身确证。

他们在后面聒噪，我在前面默然相应。就这样结束了前半段的旅途。

二

夜里，一个人待在旅馆的大床上，并不因为旅途而有丝毫的倦怠。

大床虽好，但床头灯太暗，又忘记带老花镜，只能雾里看花一般读伯林的《扭曲的人性之材》，但伯林是不可能对你进行催眠的，于是读至近凌晨三时，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他的世界，进入了黑甜乡。

第二天一醒来，我就对人说，如果我们称某人是一个智慧的人就已经是对他的最高赞誉，而对伯林你不能这么说，因为他是一个开启了认识之门的人。他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又一扇的门，他本人消失在最前面的那道门的前面。虽然他已经死了，他仍走在前面为我们开启剩余的门，以便我们随后到达时可以顺利地通过，所以我们虽然手捧他的一本书，却是不可能看得见他本人的。

我最初读的是他的《浪漫主义的根源》。他的论述仿佛不是一

种论述，而是一股看不见的力量，这股力量可以与大自然的雄浑之力相媲美，而且比自然之力更为清晰。在这本《扭曲的人性之材》中，我再次看见他对于浪漫主义的认识如何撬动了对于现代历史进程更多的认识之维。而当我看到他如何发现了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有关战争的那番雄辩来自于哪里时，我觉得我内心的颤动一直传导到仍存在于二十岁时间段里的那个青年之我。我发现青年的我并未死去，而是仍会像一个青年一样，因为纯粹的思想而激动地站立起来。

三

第二天，又在路上。

去河曲的路，我以为我已经走过一遍了，因为我的记忆中仍存留着若干黄色山丘，但一路上竟一点也没有看见记忆中的痕迹。到宁武县境内云雾缭绕的山林中时，我不禁大为惊叹。

我们三辆车同行，我和赵勇、吕新一辆，另外两辆车上有李锐夫妇和张石山等人。

车停一险要处，人从车里走出来，立在山顶的云雾中，指指点点。张石山介绍说，这里自古以来为华北第一林区，这里的树木一千棵捆成一排沿河漂流而下，为的是送达皇宫。他指着沟底说，下面有一虎啸泉，说的是泉声如虎啸也。

复又进入云雾中穿行。凝望窗外，忽然想到，昨晚看过的伯林书中的欧洲浪漫主义，在伯林看来已经横扫过一切了，但它却并未亲手拂拭过这里的重峦叠嶂。而我们努力睁大眼睛，

试图穿透这层层云雾，极力想要看出属于我们自己的新传统究竟是什么？

四

我跟赵勇坐在后座，聊着我们共同认识的朋友的一些趣事。

吕新坐在前面，除偶尔答问，其余时间一声不出。吕新在人群中的沉默是山西文学界尽人皆知的，这与他的汪洋恣肆的小说语言形成一种有意味的对比。

赵勇是我从二十多岁至今的老朋友。我们在一起总是有话可说。我们的谈话可能对前面的吕新形成干扰。我在心里不断地向吕新道歉。

吕新生存在他的小说精神里，他或许可称为一个单向度的审美的人。他大概只需要独自叙述他心中的故事。这个人对于了解他的人本身就形成一道风景。在他面前，甚至在他背影的一瞥之下，我们都即刻变为俗物。

赵勇自从近三十年前，我们都在二十郎当岁时，与我在高考补习班分手以来，尽管我始终认得出他，他也表示我是他所熟悉的一个人，但近三十年来他所经受的千锤百炼的学术训练一定已经在他的内部铸造了一个不同的人。他需要维系的是有关他个人的一段历史的记忆，以便有时能够确认来时的路。我就是他的个人历史之路上的一个路标。

我们有时会承担起这样的一种义务。但仅仅因为这个，我们当然还不能说就成为历史的义工。